



党员领导干部能力素养大课堂

党员领导干部

十七堂文化修养课

何怀宏
葛剑雄

等著

领导干部要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
建设学习型党组织权威读本



华文出版社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

十七届六中全会文化体制改革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领导干部理论学习重要读本
学习型党组织建设重要读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党员领导干部能力素养大课堂

党员领导干部

十七堂文化修养课

何怀宏
葛剑雄

等著

 华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党员领导干部十七堂文化修养课 / 何怀宏等著. —北京: 华文出版社, 2010.3

ISBN 978-7-5075-3084-1

I. ①党… II. ①何… III. ①文化—中国—干部教育—学习参考资料
IV. ①G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35444 号

书 名: 党员领导干部十七堂文化修养课

标准书号: 978-7-5075-3084-1

作 者: 何怀宏 葛剑雄等

责任编辑: 宋军占

出版发行: 华文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宣武区广外大街 305 号 8 区 2 号楼

邮政编码: 100055

网 址: <http://www.hwcbs.com.cn>

电子信箱: hwcbs@263.net

电 话: 总编室 010-58336255 发行部 010-58336270 编辑部 010-58336278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本印刷: 北京博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787mm×1092mm 1/16 开本 18.75 印张 234 千字

2010 年 4 月第 1 版 201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9.80 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 请与发行部联系调换

代序

百年中国：文化传统的流失与重建

刘梦溪

我所说的百年，是指清朝末年、民国初年，也就是清末民初，一直到今天这一历史段落，大体上相当于20世纪的100年。讲一讲这一历史时期的社会与文化的变迁，也可以说，是对这100年的社会历史变迁过程作简略的文化解读。就切入角度来说，这是一个历史文化学，或者文化社会学的问题。

百年中国的文化问题为什么需要从晚清讲起

晚周、晚明和晚清

理念上，研究中国的思想文化，“三晚”最重要：一是晚周、一是晚明、一是晚清。晚周——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时期，中国最早的第一流的思想家就产生于那个时候。那是中国的思想源头，是学

术的经典时期。就世界历史而言，那是世界历史的轴心时代。晚明——那是一个文化冲突非常剧烈的时期。以汉族为中心的华夏文化经过了一次血和火的洗礼。再没有比剃发易服更令一个有上千年文化传统的民族更难堪的了。所以顾炎武有“亡国”和“亡天下”的说法。“亡文化”就是“亡天下”。晚清——是从传统到现代的转折点、东方和西方的撞击点和交汇点，是中国历史、文化与社会的大转变时期。文化学家和历史学家都非常重视“历史时刻”这一概念。“三晚”都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历史时刻，是研究中国思想、文化、社会、历史的最关键的历史时期。

西人和晚清的“大变局”，中国历史、文化和社会结构，到了晚清，真正开始了大变局。不是说以前没有变化，而是说以前的变化和晚清都不相同。到了晚清，中国历史的脚步不能照原来的样子走下去了，延续几千年的统制秩序不能照原来的样子维持下去了，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和固有的社会结构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当时许多有远见的开明的官吏，都提出了“大变局”的思想。有的说 3000 年未有的大变局，有的说 4000 年，有的说亘古未有的大变局。例如，李鸿章（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说：“合地球东西男溯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又说：“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往来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中国的晚清发生这种大变化，出现千古未有之大变局，最主要的标志是“西人”大规模地进入了中国。

“西人”进入中国，本不自晚清始——汉代——佛教传入——西天明代——天主教入华——西教晚清——西潮佛教进入中国（西汉末年、东汉初年），是静悄悄地进入的（通过西域传入），起初是作为黄老方术的一种，后来也引起过争论（沙门不拜王者论），甚至出了好

几个主张灭佛的皇帝，但阻挡不住。主张灭佛的皇帝远没有信佛、佞佛的皇帝多。佛教经历了漫长的中国化的过程，终于出现了最适应中国人心性的禅宗，宋代的思想大合流，然后是民间化和世俗化。佛教传入中国的过程，是中国文化吸纳、消融外来文化的显例，是华夏民族文明的伟大处。它的特点是充实主体、融化客体、思想再生、铸造新文明。明代的西教、天主教，一般以明朝的万历年间，万历十年（1582）意大利人利玛窦来华为标志。西方的传教士带来了天文、历法、数学、火炮制造等西方的科技，也把中国的文化反馈到欧洲，对中西文化交流起到了早期的带领作用，但在宗教传播方面，始终表现为与中国文化的冲突。利玛窦曾经尝试着让天主教适应中国文化的特征，他的努力获得相当成功，后来由于罗马教廷的干预，引发了所谓“礼仪之争”（祭祖拜天），两种文化的冲撞占据了主要位置。但这次“西人”进入中国，增加了双方的初步了解，就中国一方而言，自己文化的主体位置丝毫未发生动摇。所以如此，是由于汉、唐、明直至清中叶，中国的国力是强盛的，“西人”带来的文化，不过是“以文会友”，所以宾主分明，客人就是客人，无论如何成不了主人。

“夷务”和“洋务”晚清就不同了。道光、咸丰以后，中国的国力日趋衰弱，社会问题严重，统治集团腐败。在这种弱势的情况下，“西人”来了，不再是“身怀绝技”的传教士只身远游，而是开着军舰、手持枪炮的大队人马前来叫阵。主人的态度也不是开门纳客，紧闭的大门是被人家用“坚船利炮”打开的。于是，有了1840年的鸦片战争和1842年的《南京条约》（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有了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北京条约》（一个更加丧权辱国的条约）。英法联军于1860年9月9日火烧了圆明园。此时之“西人”已经反客为主，中国文化的主体位置、国家的主权地位，遭到根本动摇。当时先觉醒的知识分子、开明的官员，也想出了一些对

付洋人的办法，当时最流行的话语是“夷务”，如何处理“夷务”成为关乎国家根本利益的大问题。想出的办法包括“以民制夷”“以商制夷”“以夷制夷”“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等等，但都没有多少效果。不过朝野上下形成了比较一致的看法，就是知道自己落后了，应该自强，所以晚清有长时间的“自强运动”。看到洋人技术先进、武器精良，意识到自己要有近代工业、要有洋枪洋炮，于是开始了“洋务运动”。“夷务”后来变成了“洋务”。曾国藩、李鸿章、沈葆楨、左宗棠、张之洞等晚清大吏，是早期“洋务运动”的积极倡导者。特别是李鸿章，他是清季办洋务的最主要的代表人物。但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李鸿章倾毕生心血建立的北洋舰队全军覆没，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不是败在力量悬殊的“西人”手下，而是败给了同属东方的近邻、一向被称作“蕞尔小国”的日本，中国的面子丢大了，全国上下一片沸腾。

中日甲午战争的悲剧性，不单是败在一个小国的手下，因为日本经过了明治维新，小国已经变成了强国。它的深层悲剧在于：不该战而与之战而且战败。翻检一下中日甲午战史，可以看到：战前、战中、战后，中方的应对策略，处处中日本的圈套。日本制造各种借口，想一举消灭北洋水师。李鸿章知道北洋水师不是日本的手，本来想避免战争，但由于翁同龢为首的清流主战派挟光绪皇帝给李鸿章施压，李的具体布防措施也一再发生错误，还是不由自主地走上应战不敌的道路。甲午战争的前三年即1891年，李鸿章在奏折里说：北洋有新旧大小船舰共25艘（大船只有镇远号、定远号等6艘），还要增加多只船舰，才能构成战斗系列。朝廷没有理会李鸿章的请求。甲午战争的当年即1894年，李鸿章又上奏折，要求添换新式快炮21尊，如果办不到，镇远、定远两舰的快炮12尊，无论如何应该购买，仍未获准。实际上自光绪十四年即1888年开始，北洋水师就没有添加任何装备

(史书上说“未增一械”或“未增一船”),原因是购买军械的银子被慈禧太后移做修颐和园用了。甲午战争八月打起,七月李鸿章上奏折再次陈述:中国的六艘大船,即镇远号、定远号、济远号、经远号、来远号、致远号和靖远号,只有镇远号、定远号是铁甲船,可用,但时速仅15海里,而日本可用快船有21艘,9艘是新船,时速20至23海里。双方海上力量对比悬殊。李鸿章因此明确表示:“海上交锋,恐非胜算。”因此研究晚清史事的人,有一种说法,甲午战争的失败,李鸿章固然有责任,翁同龢、张謇、文廷式、张之洞等清流主战派,也有误国之责。所以甲午战败后,朝野上下责备于李鸿章,明智之士都是说他明知不堪战却不能顶住压力,没有“犯颜直谏”。史学家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和父亲陈三立,就曾在《马关条约》签定后致电张之洞,呼吁联合全国的督抚共同请求将李鸿章斩首。陈宝箴说:“勋旧大臣如李公,首当其难,极知不堪战,当投阙沥血自陈,争以死生去就,如是,十可七八回圣听,今猥塞望谤议,举中国之大,宗社之重,悬孤注,戏付一掷,大臣均休戚,所自处宁有是耶?”后来黄秋岳在回忆这段往事时写道:“盖义宁父子,对合肥之责难,不在于不当和而和,而在于不当战而战,以合肥之地位,于国力军力知之綦审,明烛其不堪一战,而上迫于毒后仇外之淫威,下刦于书生贪功之高调,忍以国家为孤注,用塞群昏之口,不能以死生争,义宁之责,虽今起合肥于九泉,亦无以自解也。”

所以,100年前的中日甲午战争的悲剧在于:不是不当和而和,而在于不当战而战。

中日甲午战争是1894年打起来的,第二年即1895年签定《马关条约》。其直接结果是北洋舰队的覆没——这固然令人哀痛,固然非常重要,比这更重要、更令人哀痛的是割让台湾,把我们的第一宝岛送给了日本人。1895年日本人占领台湾,直到1945年才归还中国,



慈禧像

日本占领台湾整整 50 年。直到今天这 100 年前的结果还在影响着我们。李登辉等人的出现，显然与日本的统治、奴化、豢养有直接关系。我想向各位国家栋梁提醒一点，在我国由传统走向现代的历史上，有过三次现代化的努力：一次是清朝政府迫于列强的侵扰所做的初步现代化尝试，特别是洋务派的三十年的辛勤积累，通过 1894 至 1895 年的中日甲午战争，被日本强行打断

了；第二次是民国政府的现代化努力，由于 1937 年日本军国主义的全面侵华战争，被再一次打断；我们现在正在进行中的现代化进程，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化，也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第三次现代化努力，已经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果，但我们的现代化进程还没有完成。

以上是我讲的第一个问题——简述百年中国的文化问题为什么从晚清讲起，特别说明中日甲午战争是近代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因为百年中国的文化传统的流失与重建问题，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发生的。

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及其在晚清社会所遭遇的危机

“文化传统”和“传统文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传统文化”，是指传统社会的文化。一般把周秦以降直至清朝最后一个皇帝退位，也就是1911年辛亥革命之前，称作传统社会。当然无法用1911年把传统与现代作一截然划分，文化与社会变迁比政治事变要复杂得多。宽泛一点看这个问题，也许讲清末民初是中国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转折时期，在语义和事实上比较恰当。总之，晚清以前的中国文化可称为中国传统社会的文化，也就是传统文化。传统文化的内容，取决于我们对文化一词如何定义。人类学家对文化一词的解释是多种多样的，美国人类学家克罗伯（Kroeber）和克拉孔（Kluckhohn）在他们20世纪50年代合著的《文化：关于概念和定义的检讨》一书中，列举出160多种西方学者关于文化的定义。70年代以后，符号学盛行，对文化的定义就更多了。我个人使用的定义，是自己在研究中抽绎出来的看法。我倾向认为，文化应该指一个民族的整体生活方式及其价值系统，这是广义的用法；狭义的用法，可以指人类的精神生产及其成果的结晶，包括知识、信仰、艺术、宗教、哲学、法律、道德等等。因此广义地说，中国传统文化就是指中国传统社会中华民族的整体生活方式和价值系统。

中国文化特质及价值取向 那么中国传统文化都有些什么特质呢？第一，历史悠久。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自夏、商、周三代的夏朝算起，有4000多年，所以号称5000年的历史文明。从周秦算起，有3000多年。世界四大文化圈：古希腊罗马文化、阿拉伯文

化、印度文化和中国文化，其中中国文化是世界最古老的古文明之一。第二，中国传统文化是在一不间断也是在较少变化的传统社会型态框架内生长的文化系统。梁漱溟先生说：“百年前的中国社会，如一般所公认是沿着秦汉以来，2000年未曾大变过的。”秦汉到晚清都是封建制度，说社会型态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或较少变化，应该能够成立。但这不妨碍不同历史段落的文化有不同的特色。如殷周时期的青铜器文化、秦汉的制度文化、唐的多元繁荣、宋的思想、明代的城市生活、清的学术，等等。就文化的形态学术思想而言，不同历史阶段都有不同类型的高峰期，如春秋战国时期的子学、两汉的经学、魏晋南北朝的玄学、隋唐的佛学、宋代理学、明朝的心学、清代的朴学等。第三，中国传统文化是一多元文化形态。就其发生来说，是多元的。过去说中国文化是黄河文化。现在学术界的看法：长江文化是与黄河文化不同的源。就其族群的构成来说，华夏文化为主体，同时包括众多民族的文化。就文化思想来说，儒、释、道三家主要思想学说，呈多元互补之势。第四，中国文化是富有包容性的文化。它的同化的功能很强，孔子说：“夷狄之入中国，则中国之。”各民族之间的融合，文化是最好的溶解剂。中国文化对异质文化的吸收和消化能力是惊人的，明显的例证是对佛教的吸收。华夏民族不排外，即使穷乡僻壤，也懂得尊重外来者的文化习俗。第五，就生活形态来说，中国传统社会主要是农耕社会，所以其文化精神，正面说有吃苦耐劳、生生不息的特点；负面说常常表现为自给自足的心理、缺少冒险精神、重农轻商，等等。中国传统社会长期抑商，所以商品经济不够发达，这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个症结。晚清与外人打交道陷入被动，国力不强固然是主要原因，缺少商品意识和市场观念，也是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第六，中国传统社会属于宗法社会的性质，以家族为本位、家国一体，是传统社会形态

和文化形态的重要特征。家不仅是生活单位，而且是生产单位。家庭成员一般不远离家庭。孔子说：“父母在，不远游。”如果一个家庭的成员长时间出离在外，就叫“游子”，“游子”如同幽魂离开躯体，其身份是很悲哀的。传统社会的家庭不只是一家一户的家，还要扩大、辐射出“家族”。因为家庭中以父亲为主轴，父的父是祖父、父的兄是伯，父的弟是叔，父的姐妹是姑；母亲方面，母的父是外祖父、母的兄弟是舅、母的姐妹是姨；父亲的兄弟姐妹生的孩子，又构成堂兄弟、堂姐妹系列；母亲的兄弟姐妹生的孩子，构成表兄弟、表姐妹系列。祖、父、兄、弟、伯、叔、舅都会娶妾，又会生育，于是又衍生出庶出的一大群。于是便有了嫡、庶的问题。而且每一支系都有固定的名称，这和西方是完全不同的。大的家族有族长、有管家、有佣工、有保安巡逻人员、有统一的祭祖活动，对有过失的家族成员可以刑讯处罚、甚至处死。俨然是一个“准”国家。中国古代理念上（不是说事实上）没有“社会”这个概念，“家族”成为社会的基本单位，或者说家族的分布和联结网络就相当于社会，它是以血缘为纽带，而不是靠契约来维系。家族还有传宗接代的功能，娶妾的直接目的就是家族传宗接代功能的补充（对男性亦有性调剂的作用）。家的横向辐射是家族，纵的联系就是世系。因此传统社会常把“家族”和“世系”并称，叫“家族世系”。因此传统社会非常重视家谱，谱牒学是一项专门的学问。西方人类学家重视“族群”的概念，在中国主要表现为“家族”。甚至很少使用“国家”这个概念，经常使用的是“家国”。研究者也有的说，中国传统社会只讲“忠君”，不讲“爱国”。至少中国古代并没有“爱国”这个概念。但重视“天下”，“天下”包含“社稷”和“苍生”两部分内容。“社稷”原意是对土神和谷神的祭祀，后来用来指国家政权。和社稷连用的是“江山”，“江山”指疆土、国土。社

稷和江山加起来，相当于国家。“苍生”本义是指长得很乱的草木，后专指百姓。总之，在中国传统社会：社稷 + 江山 = 国家 社稷 + 苍生 = 天下。第七，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国家的政治结构和家庭网络主要靠儒家学说编织而成，因此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第八，中国人的自然观，对自然的態度，是主张“天人合一”的，相信“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这点许多学者都有过论述，我主编的《中国文化》还专门就这个问题作过讨论。“天人合一”的思想可以使人与自然不那么对立，很适合现在的环保主张。但也有专家认为，中国人的这种哲学思想，是传统社会缺少系统的科学、科技不发达的原因。第九，中国传统社会有最完整的文官制度，这在世界文明史上绝无仅有。文官制度和科举考试有关，科举考试制度是中国独有的。唐代以诗取士，后来考八股文增加试帖诗，所以传统社会的文官大都会写诗。文官制度的最高表现是宰辅制度，相权对皇权有一定分解作用，他可以让皇帝少犯错误。第十，关于中国文化背景下的宗教信仰问题，总的看中国人对宗教的态度比较马虎。孔子说：“祭神如神在。”那么不祭呢？难道神就不存在了？宗教的态度是不允许对信仰的对象作假设的。佛教中国化之后演变为禅宗，宗教的味道已大为减弱。民间化、世俗化的佛教，随意的成分也很强。道教是自然宗教，操作性强，信仰的力度不是很坚实。中国人对待超自然的力量，信仰的成分不如崇拜的成分大，但崇拜不是宗教意义上的信仰。在中国人的眼里，天是至高无上的，是最大的神。但对天是崇拜而不是信仰，因为天并不总是能满足人的愿望。对祖宗也是崇拜而不是信仰。拜天祭祖是中国人的最高礼仪，近似宗教仪式，但绝不是宗教仪式。第十一，中国传统社会有发达的民间社会，朝野，官府和民间界限分明。儒释道三家的思想，儒家学说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道家和佛教主要

在民间。因为有发达的民间社会，有儒释道三家思想的互动互补，中国传统社会反而有较大的思想空间和活动空间。第十二，中国传统社会的不同历史时期，都有不同风格的艺术与文学。古人的文章写得很好，记述不同的事情有不同的文体。诗学尤其发达。书法艺术很独特，中国文化的精神可以在书法中找到。第十三，中国传统社会还有一些比较特异的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比如阉宦制度、有太监（明代和晚清的太监作恶多端）；施行一夫多妻制，可以娶妾；女人裹小脚，等等。这些恐怕就是传统文化中不好的东西了。

我仅仅是为了讲述问题的方便，把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标志性的现象列出了13项内容，远不能概括于万一。这些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最主要的特征，最基本的价值取向。但中国文化也有另外的特质，我无法在一次演讲中穷尽。

文化传统的更新和变异 但如果说到文化传统，就是另外的概念了。文化传统是指传统文化背后的精神连接链，并不是所有的文化现象都能够连接成传统。有的文化现象只不过是一时的时尚，它不能传之久远，当然不可能成为传统。按照美国社会学家希尔斯的观点，传统的涵义应该指世代相传的东西，即从过去传衍至今的东西（至少应该传衍三代以上）。文化传统当然存在于传统社会的文化现象之中，但它更多地是指这些文化现象所隐含的规则、理念、秩序和所包含的信仰。能够集中地体现具有同一性的规则、理念、秩序和信仰的文化现象，就是传统的文化典范。我们面对一尊青铜器、一组编钟、一座古建筑或一个古村落，人们有时也说看到了中国文化的传统，其实这样说并不准确，实际上看到的是传统的遗存物，这些遗存物所蕴含的规则、理念、秩序和信仰，才是传统。但能够留存至今的遗存物本身也是一种文化典范，里面藏有该民族文化传统的一系列密码。对于文化传统来说，信仰的因素非常重要。因为

传统之所以被称为传统，往往由于这些传统有一种神圣的感召力，希尔斯把这现象叫做传统的克里斯玛（Charisma）特质，即传统所具有的某种权威性和神圣性。可以说，如果没有信仰的因素掺入，能否形成真正的传统，并不是没有疑问。即使缺少信仰的成分，也必须融进崇拜的精神，才能凝结为传统。中国传统社会用儒家思想编织起来的纲常伦理，对家庭的结构和文化遗产来说就是一种具有权威性的传统，它里面崇拜的成分大大超过信仰。但传统不是一个凝固的概念，在连接和传衍中它会发生变异，会不断被赋予新的内容。例如，儒家思想，在先秦、在两汉、在宋明、在清代，都有所不同，都有新的成分添入。希尔斯说，对传统而言，“增添是一种最常见的形式”。事实上，只有后来者不断为既存的传统增添新的内容和新的典范，传统才更充实、更有价值，才有可能不着痕迹的融入现在，成为活着的传统。但新增入的成分在大多数情况下只能处于边缘状态，而且会遭致固守既存传统人士的反弹。除非已经进入传统变异的另一情境，即固有传统和新成分实现高度融合，人们已经无法分清楚传统构成的新与旧，甚至以为新成分原来是旧相知，传统就成为既是现在的过去又是现在的一部分了。文化传统在传承的过程中，不仅需要增添新的内容新的典范，而且需要对异质文化的吸收和融合。传统往往不是单一的，而是一种综合。对不同质的文化传统的吸收和融合，可以使固有传统因注入新的血液而勃发生机，并变得更健康、更有免疫力。唐代文化气象博大、心胸开阔、仪态轻松，就和大胆吸收西域文化、旧传统中融入了异质的新成分有直接关系。其实这一过程就是传统更新的过程。这一过程一般是缓慢的、渐进的、不知不觉的，因此也可以看作是一种文化的濡化过程。这种濡化过程一般不会引发激烈的冲突，也不会破坏既存的文化秩序。但这需要充当异质吸收的文化主体强大、有自信力和包容精神。

汉朝和唐朝的时候，中国文化的主体是具备这种条件的，所以有佛教的传入、有和西域文化的交流。到了晚清，国家处于被东西方列强瓜分的境地，有亡国灭种的危险，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完全弱化，失去了与西方文化平等对话的条件，更不要说文化的濡化了。张之洞算是有心人，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说到底也不过是“应变”的一种方式而已。其实处于晚清时期的中国社会与文化，与当时西方的社会与文化，彼此之间有好大一个时间差，西方已经是建构了现代文明的社会，中国还没有从几千年的传统社会里转过身来，双方没有站在同一水平线上。这种情况，不可能有中国文化传统对西方异质文化的正常吸收，必然爆发激烈的文化冲突，冲突的结果大家知道，是中国文化打了败仗。

中国的近代何以开始的那样晚 所以如此，是因为我们几千年的文化传统里面，没有为走向现代化准备好充分的社会与文化机制。我说的是“社会与文化的机制”，没有笼统地说中国文化本身，因为这是学术界的一个争论问题。为什么西方早在16世纪就有工业革命，就开始了近代的进程？为什么我们的“近代”开始得那样晚？到1840年鸦片战争人家打我们才开始“近代”？宋朝和明朝，城市经济比较发达，手工业和商业相当繁荣，有的研究者论证已经有了资本主义的萌芽，认为如果没有外来势力的入侵，自己也会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明朝中叶开始有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一定萌芽，历史材料可以找到一些证据，但如果说将来可以自己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则只能是学术上的一种假说。因为后来的历史发展没有给予验证。事实是中国始终没能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学术界没有争论的是，与西方相比，中国传统社会历史演进的速度实在太慢，仅是一个封建社会的时代就走了3000多年。我认为有两个因素是中国传统社会发展缓慢的原因。一是在中国历史发展的关键时期，